

贵州钱币

2018年第1期
(总第21期)

主 管：中国人民银行
贵阳中心支行
主 办：贵州省钱币学会
编辑出版：《贵州钱币》
编辑部
主 编：肖 杰
副 主 编：秦少华

责任编辑：张传新 刘 华
黄雅迪
校 对：刘 华 黄雅迪
地 址：贵阳市富源中路
318号人民银行
贵阳中心支行2楼
邮 编：550005
电 话：0851-83921722
Email: liu3921722@qq.com
刊头题字：黄锡全
2018年7月出版

贵州钱币

- 贵州出土宋代钱币研究……………杨 菊 2
崇祯背贵光背版研究和背贵铸币用途推测……………黄雅迪 7
六盘水流通货币文化特色初探……………高汉祥 12
张之洞首铸银币打破天的惊世创举……………黄成栋 15
浅谈民国时期黔东南州流通货币……………26
民国贵州军阀币研究……………31

钱币研究

- 南朝梁双柱四柱五铢初考……………王子华 34

钱币文化

- 略论唐代货币制度的发展及几点启示……………宋康年 39

交流信息

- 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名家·贵州学术年会
暨新时代·多彩黔币论坛活动报道……………易莞娇 43

目录





贵州出土宋代钱币研究

■ 杨 菊

摘要：两宋时期今贵州地域的钱币流通情况，受制于文献匮乏，以往学界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笔者尝试通过对考古出土贵州宋代钱币进行分析，进而研究两宋时期，今贵州地域的钱币流通情况，得出以下结论。现阶段贵州出土宋代钱币包含铜钱、铁钱和银锭三种，出土地主要集中在贵州北部、中部和东部，用途有流通、厌胜、铜原料和装饰四种，使用者即包括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杨氏、田氏，又包含受汉文化影响较浅的水东宋氏统治区内地方民族。

关键词：贵州；宋代；钱币

一、宋代贵州政治经济背景

两宋时期，今贵州的行政建置基本上沿袭唐朝旧制，实行“经制州、羁縻州和藩国并存”，但控制比唐朝更为薄弱。贵州是南宋采购广马、滇马的重要贸易通道；思州、播州受临近四川、湖广等地的影响，开发进度较快；存在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等地方民族政权。[《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一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357~426页。]

而关于两宋时期，今贵州地域

的钱币流通情况，受制于文献匮乏，以往学界对其的认识是两宋时期贵州货币种类复杂，变化很多，贵州没有设置专管货币的机构，官方也没有铸造和发行的货币，使用的货币，时刻都受到中原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规律的影响。[胡致祥、钱存浩：《贵州古代货币与货币流通》，贵州省钱币学会、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合编：《贵州钱币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6年。]笔者在此尝试通过对考古出土贵州宋代钱币进行分析，进而研究两宋时期，今贵州地域的钱币流通情况。

二、贵州出土宋代钱币

一. 20世纪50年代贵州省博物馆对清镇琊阡坝一带近百座墓葬进行发掘，其中只有几座宋墓发表了考古简报。其中清琊M26出土的骨珠中夹杂有2枚铜钱，分别是开元通宝和咸平元宝。清琊M34墓主头下出土1枚元祐通宝钱。[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二. 1956年贵州省博物馆在桐梓元田坝冷村五龙山清理了一座墓葬，编号桐M2，在墓葬右室出土崇宁通宝钱。[陈默溪：《贵州桐梓宋墓的清理》，《考古》1958年第2期。]

三. 1957年，贵州省博物馆对遵义皇坟嘴杨槃夫妇墓进行清理，墓葬中出土有铜铁钱，多出土于腰坑，铁钱锈蚀钱文不可释读，铜钱为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两种。[《〈遵义杨槃墓发掘报告〉摘要》，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四. 1960年，贵州省博物馆对遵义桃溪寺M1宋墓进行清理，墓中清理出1件“王铺记”银锭。[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局：《遵义地区文物志》，内部发行，1984年，第63、64页。]

五. 1965年底至1966年初，贵州省博物馆发掘平坝县马场附近的

古墓34座，其中三座宋代墓葬各出土1枚铜钱。M60出土1枚残半的熙宁元宝，M62出土1枚残半的政和通宝，M65出土1枚完整的景德元宝。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平坝马场唐宋墓》，《考古》1981年第2期。]

六. 1972年，贵州省博物馆在清镇干河坝清理北宋至明初的地方民族墓葬84座，其中7座出土有铜钱。除清M187出土明初洪武通宝钱是明墓外，其余6座墓葬仅出北宋钱，北宋钱约占总数的90%以上。7座墓葬各代钱币分别为：唐代开元通宝5枚，北宋天圣元宝2枚，天禧通宝1枚，景德元宝1枚，至和元宝2枚，绍圣元宝4枚，元祐通宝4枚，祥符元宝2枚，祥符通宝4枚，皇宋通宝8枚，政和通宝4枚，熙宁元宝4枚，大观通宝1枚，淳化元宝1枚，景祐元宝1枚，元符通宝1枚，元丰通宝9枚，宋通元宝1枚，圣宋通宝4枚，嘉祐通宝3枚，嘉祐元宝1枚，崇宁通宝1枚，至道通宝1枚，明洪武通宝1枚。除此外，在北宋时期墓葬清M172、清M205分别出土有3枚和1枚厌胜钱，由锡叶压成，正面是三鱼戏水纹，中心做钱孔形。[何凤桐、李衍垣：《贵州清镇干河坝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七. 1984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桐梓县夜郎坝清理了六座宋代石室墓，出土钱币200枚，锈蚀





较严重，90%已变形，钱文锈落。其中有熙宁通宝、开禧通宝、庆元通宝、嘉定通宝、嘉泰通宝和元丰通宝。[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贵州桐梓宋明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2期。]

八. 1985年，仁怀两岔河荣昌坝宋墓出土铁钱多枚。买地券2块，其中一块有确切纪年，“时以庚寅绍定三年孟冬吉旦置造”（绍定三年即123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2003~2013》，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00页。]

九. 1985年，玉屏县长岭乡庆岩村村民关祖堂在菜地挖出一个残破的陶瓷罐，内装古钱币，重51公斤，共有10085枚，约有50种版别，包括东汉五铢，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南唐唐国通宝，北宋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庆历重宝、至和元宝、嘉祐元宝、嘉祐通宝、治平元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熙宁通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圣宋通宝、崇宁通宝、崇宁重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南宋建炎通宝、绍兴元宝、绍兴通宝、兴隆元宝、乾道元宝、淳熙元宝、绍熙元宝、庆元通宝、开禧通宝、嘉定通宝、大宋元宝、绍定通宝、淳祐元宝、皇宋元宝，金

正隆元宝。[宪曾：《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出土大量窖藏钱币》，贵州省钱币学会、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合编：《贵州钱币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6年。]

十. 1992年，遵义地区文管会办公室、赤水市文物管理所清理了一座位于赤水市南郊文华乡望城村王塘南岸山脚缓坡的宋代石室墓，在墓主棺床下面腰坑部位的浮土表面出土有60多枚方孔圆钱，分布面积约0.70*0.40米，锈蚀严重，字迹莫辨，直径2.5至3.5厘米不等。[周必素：《赤水市王塘宋墓清理简报》，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十一. 2004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开阳平寨4处宋明岩洞葬进行了清理，其中在仓口洞出土有1枚景祐通宝、1枚皇宋元宝和1枚熙宁元宝，观音洞出土1枚嘉祐通宝。

十二. 2005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镇宁县良田乡顶坛村田脚脚遗址进行发掘，其第3层时代晚至两宋，出土宋钱包含祥符元宝、皇宋通宝、大观通宝和宣和通宝。[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2003~2013》，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2~186、214~218页。]

十三. 2007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桐梓县夜郎镇8座宋墓进行清理，墓葬中出土有少量铜、铁钱。[李飞、翁泽坤、胡昌国、刘健、李冠

英：《贵州桐梓夜郎宋墓发掘成果丰硕 发现大量精美石刻》，《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2日第5版。]

十四. 2014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遵义杨氏第14世杨价夫妇墓进行发掘，墓主椁下各掘土坑，内各置陶鼓1件，鼓面向下，内盛陶质厌胜钱若干，均铭“绍定元年”。女墓主左肩、右腰等处置有银锭。[李飞：《夷夏之间：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第113页。]

三、贵州出土宋代钱币的分析

通过对贵州出土宋代钱币的汇总可以看到，自20世纪50年代贵州省博物馆开展科学考古以来，60多年间，贵州出土墓葬、窖藏宋代钱币据不完全统计有11处，因考古发现本身具有的偶然性和出土次数、数量过少，不能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故笔者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贵州出土宋代钱币做初步的探讨、研究。

从地域上来看，贵州出土宋代钱币主要分布在贵州北部的遵义，贵州东部的铜仁和贵州中部清镇至镇宁一带。可见在宋代处于羁縻制下的贵州北部、东部和中部，其使用宋钱作为货币。此外，对于迄今还没有科学考古出土宋钱的贵州西部、南部，其可能是考古发现的偶

然性和统计数量极为有限导致的，还不能得出宋代贵州西部、南部在宋代不行用货币的观点。在两宋时期，贵州北部的遵义属于播州杨氏统治，铜仁玉屏等地属于思州田氏统治，而贵州中部清镇至镇宁一带，则属于水东宋氏统治。可见，在当今贵州出土两宋钱币的地域，分别处于播州杨氏、思州田氏和水东宋氏家族统治之下。

从材质上来看，宋代货币包含铜钱、铁钱、银锭和纸钞四大类型，在贵州已发现了铜钱、铁钱和银锭三种货币。考虑到铜钱、铁钱和银锭是实物货币，而纸钞则是依靠国家政权背书的信誉货币。宋朝未在贵州建立有效的直接统治，故两宋纸钞在贵州流行的可能性本身就不大。宋朝实行铜钱、铁钱分区流行的制度，四川、陕西等地为铁钱区，其他地区为铜钱区。贵州出土宋代钱币在黔北属于铜、铁钱共同流行，中部和东部仅流行铜钱。可见贵州北部受四川铁钱区和长江中游铜钱区的双重影响，而贵州中、东部仅受长江中游铜钱区的影响。宋代是中国货币白银化的重要时间节点，在黔北杨价墓等墓葬出土银锭，说明宋代货币白银化已经影响到处于羁縻制下的播州。

从用途上来看，玉屏窖藏钱币中时代最迟的是铸造于南宋理宗宝佑年间（1253~1258）的皇宋元



作者：贵州省博物馆助理馆员

身处西南的贵州所铸造崇祯制钱作为崇祯中期所铸钱币中一种，由于版式较为复杂，因此很值得研究。从文字风格制式来说，一直保持着较稳定的钱文书写风格和加工工艺，钱体尺寸规整，没有过小和过大的钱币，直径大约在24.5—25.2mm之间，重量一直维持在3.11至3.9克之间（说明崇祯朝贵州偏处西南一隅，远离中原战乱，社会经济相对比较稳定。）。“史载崇祯三年令各省采铜开铸，贵州贵阳府铸的崇祯通宝背贵字钱，不会早于崇祯三年。规定每钱务足一钱二分五厘，南北一体遵行。崇祯五年

正		背		正		1979.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	2	1	2	1	2	1	2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 8 •



六盘水流通货币文化特色初探

■ 高汉祥

在六盘水市货币流通历史上，有比较突出的六盘水特色，深深体现出六盘水的经济及文化地域特色。这种特色，与六盘水地区山高坡陡的自然环境，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经济、文化面貌，密切相关。

在六盘水流通货币文化特色探寻中，笔者走访了几十位商业世家、经济界老人和经济研究者，查阅了地方志等大量相关资料。在此，谨将所得奉献给大家，敬请批评指正。

六盘水市自然、经济及文化地域特色

六盘水市位于贵州西部，地处川、滇、黔、桂四省结合部，是长江上游和珠江上游的分水岭，全市地处云贵高原中部，在云南高地向贵州中东部及湖南丘陵地带过渡带上，乌蒙山脉纵贯南北，境内山高谷深，河谷深切，山高坡陡，山谷高差大，土地贫瘠，水源短缺。

因山势陡峭，石漠化情况严重，耕地短缺而贫瘠，水源短缺，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故在农耕文明时代，六盘水开发相对较

晚。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六盘水因地处内地边远山地，开发依旧相对较晚，深度较浅。经济、文化落后面貌因此，长期难改。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原始而落后，与沿海、中原内地差距均明显。

直到今天，市内四个县区，三个是国家级贫困县，一个是省级贫困县。均属石漠化连片贫困区域。

六盘水流通货币文化特色 法定制式货币短缺，非法定货币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是六盘水流通货币文化一大特色

在六盘水有历史记载的600多年来，由官方制作或指定专门单位制作的法定制式货币短浅，是个从明代持续至民国的长期过程。在明初持续至清代的500年里，六盘水流通货币以非法定货币棉纱、盐为主，法定制式货币铜、银币为辅。清末至民国的近100年里，流通货币以棉纱、盐、鸦片为主，法定制式货币铜币、纸币、银元等为辅。

法定制式货币短浅，法定制式货币严重不足，成为六盘水货币流通文化最为明显的地域特色。

法定制式货币严重不足，使得

六盘水货币流通明显原始、古朴，常用而价格稳定的棉纱、盐、鸦片成为六盘水主要流通货币。但他们与法定制式铜币、银、纸币的便捷性不可同日而语，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六盘水商品经济发展，制约了六盘水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

本土货币奇缺，是六盘水流通货币文化另一大特色

在六盘水有历史记载的600多年来，本土法定制式货币奇缺，是六盘水流通货币文化的另一大特色。六盘水流通法定制式货币数量、种类均很少。

在这很少的流通法定制式货币中，本土货币奇缺，本省制货币不易见，六盘水自身则无制作制式货币历史，盘县、六枝有过个别商人仿制云南铸币情况。流通法定制式货币，以外地为主，本土币基本看不到。

盘县一带，明及清代以云南铸币为主，中央及内地铸币为辅，本省货币不易见。清末至民国，以云南铸币为主，法国铸币、中央及内地铸币为辅，本省货币不易见。

水城一带，清代至民国，以云南铸币为主，中央及内地铸币为辅，本省货币不易见。

六枝一带，清代至民国，以云南、四川铸币为主，中央及内地铸币为辅，本省货币不易见。

“棉纱、盐、鸦片”等非法定

货币充当货币主要领域

棉纱、盐、鸦片充当货币主要领域，主要是大额支付、充当经商资本，作为大宗商品和贵重物品价值尺度及贮藏等等。当年各类商铺的资本、大额支付基本都以棉纱、盐、鸦片充当，衡量商铺资本规模也如此。

“棉纱、盐、鸦片”非法定货币充当货币原因

棉纱、盐、鸦片之所以能在六盘水市历史上长期充当主要货币，并广为流通。主要由于，一是由于六盘水落后，贵州省落后，自身缺乏制造法定制式货币能力，导致法定制式货币缺乏，为棉纱、盐、鸦片等替代货币腾出空间。二是六盘水经济落后，贫穷，经济规模过小，影响力弱，交通又极端困难，法定制式货币因此流入不易，法定制式货币短缺。三是使用价值好，使用广泛，当年棉纱、盐是人人生活必需，鸦片也一度户户生活必需，是除了粮食外最必需，使用量最大的物品。四是价值稳定，与纸币相比，在其充当主要货币期间，价值始终与银含量最足的银元相当，远非不断贬值纸币可比。五是辨识容易，远不象银元那样真假难辨，含量难测，也不象纸币那样难辨。六是有产业支撑，在当年那种男耕女织时代，几乎家家纱纺织布，家家种植鸦片。全市纺纱织布

手工业是除农业外第二大产业，全市织机最高时达万余台。特别是一战、二战期间，外国棉纱进入国内市场大幅减少，尤其是二战期间，连沪、浙等沿海地带棉纱进入内地大幅减少，六盘水纺织业一度高度繁荣兴盛。鸦片在清末民国也曾经是六盘水大产业，量大质优，通行国家中南、东南。

非法定货币流通地域

六盘水辖区各地均可流通。其间，与六盘水经济关系密切的省内周边，及云南相邻地，乃至昆明等，接受棉纱、盐、鸦片清算支付，衡量的价值尺度也相当。

非法定货币流通时期

棉纱、盐在六盘水充当货币流通时期，历经明、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历时570多年，具体时间大概在1382-1955年间。

棉纱在六盘水流通，特别兴盛时期主要有两期，在民国初的1912—1920年和1938—1945年底。

民国初一战期间，因战争外国棉纱进入六盘水市场大幅减少，六盘水纺织业一度很兴盛，带动各行业，经济发展很快，货币需求大增。棉纱在六盘水充当货币流通，自也很兴盛。

二战期间，外国棉纱和沪、浙等沿海地带棉纱进入六盘水大幅减少，六盘水还要生产棉纱供应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纺织

业一度高度兴盛，各行业繁荣发展，经济反常繁荣，民众生活水平反常大幅提高。棉纱货币流通，异常兴盛。

1950年后，随着全国统一，纺织业机器工业大发展，纺织业手工业受到大冲击，六盘水纺织业手工业迅速萎缩、破产，经济反常繁荣不在，棉纱充当货币流通经济土壤失去。人民币威信的建立，更从货币上阻塞了棉纱充当货币流通的道路，棉纱充当货币流通的路终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终止。

鸦片在六盘水充当货币流通时期，历经清末、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历时80-100年，具体时间大概在1860-1955年间。

鸦片在六盘水流通，特别兴盛时期主要有两期，在民国初的1912-1920年和1938-1953年底。与社会不安定密切相关，社会不安定，鸦片种植普遍，流通顺畅，社会安定，种植、流通受制约。1950年后，全国统一，政府强力禁止，人民币威信又树立，鸦片充当货币流通土壤失去，鸦片充当货币流通的路终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终止。

参考书目:

《六盘水市志》

《盘县特区志》

作者：人民银行六盘水中支干部 贵州省钱币学会理事

张之洞首铸银币打破天的惊世创举

■ 黄成栋

中国机制银币起源的历史背景

人们为了交换资源才发明钱，为了支配本地乃至世界更多的资源，就会发动无硝烟的货币战争。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的“三宝”：茶叶、瓷器和丝绸，占世界市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和货币经济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白银在唐朝作为流通货币，元朝时流行元宝。明朝时因与西班牙、葡萄牙贸易，银币大量流通，亦使中国成为使用银本位的国家。400年来，“欧洲人从美洲发现的13.3万吨白银就有4.8万吨运到了中国。”西方白银源源东流，中国商品滚滚西去，造成世界金融的天平，向中国一边倾斜。

1704年开始，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及同时期的西班牙殖民地亦开始铸造、使用金币，并大量囤聚黄金。1821年英国正式确定使用黄金做本位货币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在英国战略家看来，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与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

英国银行家们，选择了东印度

公司与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作为打击清朝的致命武器。“1790年—1838年，东印度公司走私运进中国的鸦片，由每年几百箱增至万箱，总量高达40多万箱，每箱平均价750银元，总价超出2.3亿两白银以上。”

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直到乾隆年间，1781年，国家库藏白银7000多万两，至1789年，还有6000多万两。到了1850年时仅剩800万两。已不足以应付一场战争了。正是鸦片战争摧毁了大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基石——白银货币本位。”鸦片贸易成了中英两国在金融领域殊死搏斗的主战场，民间还出现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原“1两白银折合铜钱1000文，竟飞涨至1600文。”这样一来，持铜钱多的百姓，交赋税需折白银时，就加重了负担。鸦片贸易，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西方列国纷纷用银币打开了中国大门，有专家认为，鸦片贸易摧毁中国银本位，又抢占了中央银行这个战略制高点，掌控资本与信誉的流通管道，完成对晚清金融边疆



的控制，致使清朝丧失贸易决定权、工业自主发展定位权、政府财政税收权和国家军事开支权，结果中国的货币体系被推翻，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英镑成了世界货币。

历史事实证明：清朝的衰败，货币战争先于军事侵略。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道光十八年（1838）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英国除用鸦片战争来维护其金融体系运转外，还以巨额货币赔款形式来控制中国资源。

清政府为了填补赔款所造成财政空虚，不得不同意张之洞铸行银、铜元以赢利。所以，铸造银、铜元的初衷，就是为了解救财政危机，仅是权宜之计。

外国机制银币的产生及流入中国

十五世纪中叶，各欧洲王国开始经济竞争，纷纷通过建立贸易航线和殖民地来扩充财富。

1492年8月3日至10月12日，意大利著名探险家、殖民者、航海家哥伦布，得到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支持，带领有87名船员的船队到

达美国佛罗里达州以东，古巴和加勒比海以北的巴哈马群岛。后又三次西航，到过中、南美洲等地。这一偶然发现的“新大陆”，哥伦布宣布为西班牙帝国的领土，从此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巴拉圭及乌拉圭等成了殖民地。西班牙利用“新大陆”盛产的白银，大量铸造“双柱”银元，流通几乎遍布全世界。



墨西哥银元



西班牙银圆



英国贸易银元

外国人是用鸦片换取中国白银，铸成银元又返销中国。这是一种先造成清朝经济崩溃，后用武力

征服的战略。

1519-1521年，墨西哥被西班牙征服。随即在墨西哥又发现大银矿，开始大批量生产“新双柱”银元，由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银元从明万历年间流入中国。人们认为它的大小、轻重都比较适中、合用，所以它最为通行，最受欢迎。

“西班牙本洋自明朝末年至清道光二十三年（1643—1843），二百年间输入1亿多元，墨西哥鹰洋到清末输入近3亿元。外国银圆的大量输入，套购我国大量的白银。因外国银圆一般重七钱二分，含银90%，即含银六钱四分八厘。但银圆形式划一，计算和使用方便，民众乐用，故在兑换中国元宝、银两时可兑到七钱二分甚至八钱，导致每枚银圆亏损银一钱左右，每年损失纯银数百万两，长此以往，损失无法估计。此情引起朝野重视，不少有识之士纷纷要求自铸银圆，维护我国的权益。”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记录，1681年至1833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6800万两以上，合银元1亿枚，绝大部分是双柱银元。”

“1895——1935年，英国在孟买、加尔各答及伦敦铸造了“英国贸易银元”，“总铸数近2亿7七千万枚”，“1895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附近，内华达州首府卡森城，发行银矿。“1973年后，美国为了争夺远东贸易和抢占墨西哥鹰洋市

场”，美国贸易银元总铸数35,966,139枚”，大多数销往中国。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成了万国银币市场，是贸易地，更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外国银元无孔不入。他们携来本国银元与我国进行通商。就连穷乡僻壤的贵州于光绪十六年（1836）（指银元），流入贵州甚少，民众尚不习惯，贬值可以接受。光绪年间，省内大量土特产品外销中，银元大量流入。光绪二十五、六年间，安顺已有两广商人携带“飞鹰洋”（指墨西哥银元）、“站人洋”（指英国银元）、“坐桩洋”（指法属安南银元及日本龙洋）。

外国银元，初称番饼，或称番银，亦称洋银。当时民间依其圆形，故称之为“银元”。各国所铸，名目繁多，又有许多俗名，诸如马剑、站人、坐人、鹰洋、蝙蝠、大髻、小髻、蓬头、双柱、烂版、光面、佛头等，而其中要以西班牙本洋和墨西哥鹰洋输入为最多。

以贵阳为例看中国银两的衰败

银两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称量货币。始于东周初期，盛于明清年代。以贵阳为例，据官方统计，民国六年（1917）12月15日，贵阳流通中白银约为100万两。笔者的祖



父在贵阳清镇卫城开的银匠铺，经常收银两和大洋，熔成片，手工打制少数民族的银饰。大锭银子形状砧码，两头弧状，束腰。铸有地名、用途、工匠姓名等。大锭50两，中、小锭有10两、5两、3两、1两。还有纹银、票银、片银、碎银等，省内铸品多为“裸子”形。省外流入的有方形、圆形、片形和船形、牌坊、槟榔、砖头形等。有的奸商，从银锭边、底切口，灌入铅水，涂贴重砂或水银，掺入杂质，市场称之为“绒口银”、“半边俏”和“透身酥”。因此，收银时，必须审辨真伪，评实成色，经常发生争议，费时费事。当时贵阳盘桥以西（今河西路），有私营高炉银匠七八家，可把碎银熔铸成块、成锭；或将白银化整为零。

银两沉重，不便带，各地成色不一，加之平砵（计量标准）有大小，折算十分繁难。

民国初年，通用平砵有3三种官平：“库平”，指清政府征收租税用的标准平，一两合37.301克，折合贵阳公估平一两零2分5厘5毫；“关平”，道光二十三年（1823），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一两含纯银37.7994克，比库平大，英国人又多捞了银子；“漕平”，每两含银36,65克，沿海对漕粮征收用。另一种民间使用的称“市平”，各县又有大小区别。

“贵阳公估平1000两相当于北京公砵（估）平1008两，上海规元1066两，汉口洋例1035两，汉口估平1010两，广西司马平973两，重庆渝平1015两，云南滇平1010两以及成都九七川平1012两。省内贵阳公估平1000两折合“贵平”1007两。大定平100两相当于贵平99两，相当于毕节平101两。由于平砵混乱，纷争时起，光绪十年至十二（1884—1886），贵州巡抚判霁建立、‘公估局’，凡流入的银锭、元宝，必须经过该局批估，标明成色、重量，加章证明。光绪十六年（1836），贵州大量土特产外销，外国银元流入。”

外国银元大量流入，外商银行操纵金融市场，银钱比价与官订价发生差错，各地银两与银元的比价更加难以换算。官方与钱庄利用银两、银元与铜钱反复折兑之机，又从中牟取暴利。再说，市民完粮纳税，往往以钱易银，亏折甚多。

民国22年4月5 日全国实施“废两改元”，规定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贵阳于民国24年（1935），贵阳中央银行成立，推行法币政策，白银收归国有，银两制度在省内彻底废除。

林则徐的银圆梦

外国银元大量输入，套购我国大量白银外流，引起清朝朝野的恐

慌。像林则徐等一些有识之士，挺身而出，建议朝廷铸‘道光通宝’银元，“欲抑洋钱”。因“外国商人向中国购买茶、丝和瓷器等及输出的鸦片，都用“双柱”结算。上海的商业记帐以“本洋”——双柱为标准。当时外国银元一枚抵银子一两，由于一枚外国银元重0.72两，成色为90%，折合成白银为0.648两，故一枚洋钱不等值于一两纹银，这一不等价交换造成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有将外流的白银铸成洋钱倒流进中国进行购货，以赚取巨额利润”。

“道光十三年（1833），江苏巡抚林则徐在《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摺》中记有“每年外流纹银数百万两”。又说：“自粤贩愈通愈广，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其势断难骤遏，盖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易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须换兑又便携带，是以不胥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此系实在情形。或云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郭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上述建议，结果未被采用。”

土制银元——机制银币的开端

乾隆、嘉庆年间，当时中国使

用的银锭，与外币换算相当复杂。西方银元使用机器冲压新工艺铸造。中国传统浇铸工艺根基开始动摇。政府朝野纷纷寻找对策，确定仿制银元。中国自铸银元，先是在民间和地方政府仿制基础上开始的。



郑成功打制的“漳州军饷”银币

早在1654 - 1660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为筹集军饷，用手工打制了一批‘漳州军饷’银币。1662年台湾收复后，郑成功长子郑经（字谨性）又在厦门铸造了一批‘谨性军饷’币。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为了抵制大批劣质尼泊尔银圆输入西藏，清廷同意西藏在贡布地区觉木宗制造银圆。起初用手工模具打制，1909年开始以水为动力，用机器铸造。

咸丰六年（1856）上海三家银号用小型机器试铸壹两银圆共4种，流通市面后民间称便。光绪七年（1881），吴大澂在吉林设立机器局，用小型机器试铸少量一两制银圆。

明朝中叶，西班牙和葡萄牙商

此时贵州出现了稀有珍品。
“光绪十四年、十六年（1888年、
1890年）贵州官炉借鉴它省经验，
铸造发行黔宝银饼。银饼分为7钱2

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中国不仅流光了白银、土地，更丧失了国家主权，那时，金融遭破坏。中华民族已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人民盼望中国出一个力挽狂澜的伟人，拯救清政府于水深火热之中。很多历史资料证明，张之洞挺身而出，不负众望，他在广东干出了一翻惊天动地的伟业。张之洞铸造的中国第一块银元，凝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史，闪耀着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光辉，也显示了张

民国四年(1915),时任民国政府币制委员会委员长章宗元,在《中国泉币沿革·银元沿革》说:“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粤督张之洞奏称:广东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波及广西、至于浙、皖、鄂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四川、前后藏无不通行,以致漏把无底,粤省拟试造外洋银元,每元重漕平七钱二分,今拟每元加重一分五厘,银元

上面铸‘光绪元宝’四字，周围铸‘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十字，并用汉文、洋文，以便与外洋交易，支放各种饷需农项与征收厘捐、盐课、杂税及粤省洋关税项，向收洋银者均与洋银一同行用等语。是为中国仿造银元之始。二十二年（1896）户部议复御史王鹏运饷银元折内称：‘银元之铸，开办于粤东，现复试办于湖北，至京城开铸，工匠生疏，不如仍旧湖北、广东两省，加增扩充，此外沿江沿海各省亦可自行设局’等语。二十四年（1898）部议准山东自铸银元。二十七年（1901）七月十三日上谕：‘铸造银元与圆法相辅而成，较为便利，各省所铸银元惟广东湖北两省成色较准，应即就该两省多筹银款，源源铸造，即应解京饷，亦准拨成作本，并兼铸小银元，以便民用，而收盈余，每次报解京饷，准其搭用三成，所有铸造余利，尽数核实归公。此外各省，并可拨款附铸，亦准拨解京饷，各省关解部库，均按三成搭收，一切支发俸饷等项亦统按三成搭放，俟畅行后，再行按成递增等语’；



广东“蟠龙”银元

“鸦片战争后，开五口通商，各国银元因有利可图也随之流入。作为替代“双柱”的“鹰洋”流入的最多。一时竟成为中国市场的标准货币。中国的经济利益被大肆侵害，同时，一国之内，元银并用，有害无利，在如此情况下，清廷接受广督张之洞的建议，首先在广东省铸造‘光绪元宝·蟠龙图’银元。先是重库平七钱三分（27.39克）因分量重于‘鹰洋’，所以后来改成库平七钱二分（27.00克）。嗣后各省仿铸，直径、重量、成色大都相同”；

据《古钱银圆·收藏与鉴赏·中国银元发展史》载：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抵制外国银圆的入侵，多次奏请自铸银元。光绪十四年（1888）获准建厂，即从英国进口造币机器。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初六正式试铸库平七钱三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六厘、七分三厘和三分六厘五记重新型银圆一套。后陆续铸造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等精美标准银圆。接着湖北、浙江、四川等十几个省市相继设局，均以广东银圆模式为准，纷纷开炉铸造，使机铸银圆很快普及开来。

两广总督张之洞呈准在广州设“广东钱局”，机制龙洋，这是我国正式机制近代银元的开始。该币

有壹圆、五角、二角、壹角、五分等币值。均比从前的银币重，以库平七钱三分为率，并将英文铸正面，以便与外洋交易，故亦称‘七三反版’。该币发行不久，即行改制，流通极少。正面：珠圈内有满汉文“光绪元宝，外环英文，两侧小花。背面：正中蟠龙图案，上下分外环楷书“广东省造”四字、“库平七钱三分”10字，两侧小花。重量27.40克，成色90%，直径39.5毫米。

《世界硬币图鉴·绪论·世界硬币的沿革、鉴赏与收藏第5页》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设局，购置西方造币机器铸造‘光绪元宝’（俗称龙洋）银元。”

据估计，仅有蟠龙图案的银元，其铸造量为3亿枚左右，而其中以‘光绪元宝’（光绪三十四年、北洋造）铸了近一亿枚为最多，‘大清银币’（宣统三年）铸造数量约7700万枚，名列第二。在张之洞在铸造机制银、币的实践中，不仅再创了辉煌，并促进了东西方钱币文化的前所未有大融合。

当时市面的各种银元均重七钱二分，该币精美，图案具有中国特色，含银超标，又是本国货币，故民众乐于收藏。一些图利者也收入熔化，以铸低劣币。

当时，张之洞洞察人们收“七

三”版增值的心理，打了一套组合拳。先抛出彩球，转移了注意力时，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堆出来的广东银元套币：“七钱三分”、“三钱六分五厘”、“一钱四分六厘”、“七分三厘”和“三分六厘五”记重新型银圆。接着陆续铸造“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等成套精美标准银圆，最后抢到根据地，强夺了制高点。

张之洞在银币上“加重一分”银币，是脱胎换骨的，是有中华灵魂的瑰宝，它不仅广东系列银币却站稳了脚跟、抢回了一个制高点，也奠定张之洞祖师爷的地位。

自光绪十六年（1890）改铸以七钱二分纪重后，接着十几个省市相继设局，均以广东银圆模式为准，纷纷开炉铸造，使机铸银圆很快普及开来，机铸银币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并逐步抱团取暖，形成合力争市场的格局。

百多年来，张之洞铸机制银币，显示了中国人的金钱意志力量的爆发。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成功实践，把驱除外国银币的货币战争推向深入。其爱国行动，激发了中国人自力更生铸币的热情，中华欣起一股“银币热”。张之洞主政湖广多年，百姓口碑颇佳。他在广东、湖北铸造银

元，提供援助，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爆发创造了条件。他以“龙洋”引领，中国人打赢了一场货币战争，确实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行动。难怪孙中山称赞张之洞“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中国自铸的银元，是历史的产物，它具有中华文化的历史价值与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奋斗、团结和梦想精神。

广东七三反版银圆打破天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此币系我国新式机铸银圆发行之一种，因当时市面上的各种银元均重七钱二分，为使民间乐于接受起见，特将此币加重一分，发行之后，果然大受欢迎，因其为本国自制，且制作精细，图案美观，含银成色标准，更较其他银圆略重一分，以致虽大量发行但市面上仍不多见，民众乐于储存。当局见此状况加上当时和我国合作的英国汇丰银行提议，认为应以七钱二分为率，经主持此币铸造的两广总督张之洞采纳后，七三反版银圆停铸，仍将之改为七钱二分，并将背面图案加两小星。此币较其他银圆重一分，流通日久，遂为他省造币厂熔毁以铸成色低劣之辅币。因此，此币至今已难得一见，精美者则更为少见”。“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接受汇丰银行建议，将主币面值改成七钱二分，中、英文仍置币面，只铸了几

枚，当局认为不合体例，故未投产。”这种‘七二反版。当时清中央认为洋文列于币面，不合体例，下令将洋文改镌于背面（蟠龙外）’。此币并未正式投产，仅留存样币三枚，是中国最著名银元大名品。

张之洞在敌强我弱、不流血的巨大战场上，以广东银元局弹丸小地，以自铸银圆为武器向外洋阵地，开了第一炮。意想不到，竟然炮打了司令部——英国汇丰银行的要害。第一回合中国赢了。西方不得不承认现实：中国自铸了七三反版银圆，且民众乐于储存，更较其它银圆略重一分。英国汇丰银行破天荒的第一次认输；张之洞和当局的巧妙外交周旋，不仅挣回话语权、决定权，还使用了婉言拒接权。看来，张之洞改七三反版为七二反版，是一种缓兵之计，以退为进，坚持保留了中国传统钱币文化的魂，几枚不合体例的样币归档休息了，却让千千万万个中国式银币却挤进了金融市场。

龙是中华民族图腾、象征，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符号。张之洞创新的蟠龙，是中国民间传说中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龙的形状作盘曲环绕。以后相继创新出了大清龙、水龙、长鬚龙、短鬚龙、大尾龙、反龙、飞龙戏珠、双龙扶珠、圆龙、飞龙、龙凤扶珠和阔嘴龙等。

龙的各种形态，开始形成了群龙占华夏的局面。系列中国化的龙王，丰富了中国龙文化的内涵。这些龙的形像，虽是一个简单符号、一种意寓，却是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创新！张之洞的群龙银元，在国内和海外都发挥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银元在我国的大量铸行，是促进古老的中国一两制向银元制的转化，推动了货币向前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货币史新的开端”中国银两制向银圆制转化，“化”就是脱胎换骨，就是揭开了中国货币发展的新篇章。中国银圆的诞生与发展，抑制了外国银圆在我国的盘剥牟利，在反抗帝国主义货币战争中也起了引领作用。“龙洋”的诞生，既标志了几千年来银两制度的历史终结，也宣告了西方发动侵略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的破产。张之洞在洋人面前昂起来头，挺起了胸，宣告在货币战争中，中国人开始站起来了。

从此中国银圆制度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规范化了。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正式规定银元为本位币，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宣统三年（1911）5月，开铸大清铜币”。从此以后，我国各省所铸几亿银圆，陆续替代了外国银圆，流通市面，逐步收回了中国人发行货币之

权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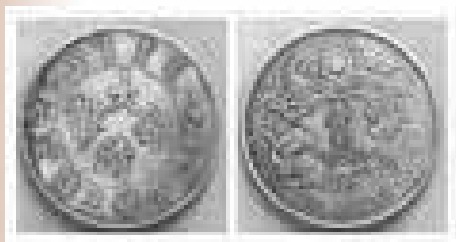
民国3年（1914）国民政府公布薪国币条例，仍以元为单位，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圆，流通全国。袁世凯民国九年造“银元图注释：这些面值我壹圆的袁世凯头像货币，尽管其上标明为民国3年、8年、但在以后的年代仍铸造过。标有民国3年的货币，一直铸造到1929年，而且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铸造过。标有民国9年和10的货币自少在1929年还在铸造。四种货币的总发行量估计超过75000万枚。”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贵阳市南明区分卷》p93;
- (2) 《南明往事·封疆大吏张之洞》沈启源p159;
- (3) 《世界硬币图录鉴·绪论》张弛等p2
- (4) 《货币战争·战国时代》宋鸿兵p12、22
- (5) 《货币战争·战国时代》宋鸿兵p13;
- (6) 孙仲汇《古钱银圆收藏与鉴赏·中国银圆发展史285页》
- (7) 朱鉴清《外国银币丛谈》p131;
- (8) 朱鉴清《外国银币丛谈·英国贸易银元》p147;
- (9) 朱鉴清《外国银币丛谈·美国贸易银元》201页;
- (10) 《贵州省志·金融志·第三章·银两·平砵与公估局21页》
- (11) 《外国银元丛谈·西班牙双柱银元及其影响131页》
- (12) 《外国银币丛谈·西班牙双柱银元及其影响》131页;
- (13) 《古钱银圆收藏与鉴赏·中国银元发展史》286页;
- (14) 《贵州金融志》25页;

(22) 1912年4月孙中山访察武汉后说：“以南皮（注：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

(29) 《贵州省志·金融志》26、27页。



银元

(4) 镍币。俗称“镍毫”，其面值有一分、二分、五分、十分、二十分五种。在民国时期实行法币期间，镍币作为辅币流通。随着法币的贬值，镍币币材价值已超过其面值而退出流通领域，部分银匠曾暗中收集镍币代替白银制作饰品出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发行金元券初期，镍币又改作金元券辅币，等值流通。



镍币

(二) 纸币

(1) 黔币。俗称“花票”、“双凤钞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贵州巡抚庞鸿书通过贵州官钱局发行官银票流入黔东南地区流通使用，每张官银票可兑换十足票银1两。

(2) 法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统一发行“法币”。该

币期初稳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币值开始波动，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末，法币已贬值一半以上。



(3) 关金券。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发行“关金券”，与法币并行流通，规定关金券1元合法币20元。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发行的关金券面额增大到25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导致物价剧涨。

(4) 金元券。解放战争后期，中华民国政府为支撑其崩溃局面而发行了一种本位货币，即金元券。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国民政府再次改革币制，实行金元币制，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规定1元金元券兑换法币300万元，每2元金元券兑换银元1元。禁止金银、外币流通买卖或持有，限期兑换。



金元券



银元券

(5) 银元券。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七月，国民政府又改金元币制为银元本位制，发行银元券。规定1元银行兑换5亿元金元券，民众持有金元券者无处兑换，如同废纸。银元券也不受欢迎，市场流通实际上以银元硬币为主，兼用铜元作辅币，流通的纸币，多为找零时使用。

三、奇闻轶事

(一) 贵州七日票

1922年3月，黔系军阀袁祖铭发动定黔战争，进驻贵阳，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就任贵州省长。但是，贵州的局面并没有因为定黔战争的结束而平静，因为滇系军阀一直窥视着贵州省。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弟弟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黔联军敌前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不敌滇军，退入四川，贵州沦入滇系军阀的控制。

在袁祖铭任贵州省长期间，命陈廷策为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并兼任贵州银行筹备处主任，负责筹组

贵州银行。原先核定银行的资本为200万元，筹足半数资本后，于1923年初先行营业。陈廷策出任贵州银行经理，主持发行了贵州银行兑换券100万元，但仅仅发行了七天，滇军唐继虞就侵入贵州，随着袁祖铭撤离贵阳，贵州银行兑换券即刻停止使用，故将贵州银行发行的纸币称为“七日票”。



说起七日票，这么一段故事。剑河县田应铭手中有一张视为传家宝的七日票，每逢有人问起，他总会自豪地说起它的来由。田应铭的父亲原属兴义安龙人，青年时加入籍贯同为兴义安龙的军阀袁祖铭部。1923年初，田应铭的父亲所在部队接到命令从贵阳出发前往天柱、剑河一带，驰援王天培一部围歼滇军胡国秀第3旅，乱战中部队冲散，田应铭的父亲定居黄平，后因田应铭工作原因迁入剑河。就这样，作为军队军饷的七日票就被带到了黔东南，可是发行的七日票流通区域狭小，流通时间短暂，根本就没人认可，导致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张七日票也没有花出去，恰巧被视为传家宝留了下来。虽然田

次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规定“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国家三十七年的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售”。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二月，榕江县政府在一份训令中写道：“近来金元贬值，

货价一日数涨，市场已形紊乱，本政府各种税收原征收金元券，遭此影响，库存之款形将化为乌有，公教人员叫苦连天，县级财政已面临最危险关头，自三月一日起照原定税率征收银币，以渡难关”。

（三）军旅与货币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革命军独立三十四旅驻黎平时，曾发行过街票，票面有壹分、伍角两种，次年该部调离，街票已全部兑换，现已无法找到资料图片。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经黎平境内时，曾使用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兑换券，红军撤离时用银元兑回。

当年12月某日，中央红军路过黎平县蒙村，喝了邓成英大娘家3挑水，名义上是付给水费，实是送给邓大娘两块银元。红军在中黄串寨吃了杨昌华存放的一罐稀饭，当时没有人在家，红军即留下字条和20个铜钱，向此农户致歉并说明付饭钱的金额，要农户收下稀饭钱。红军朱德总司令在洪州的草坪村吃石老汉腌鱼、酸辣子和米饭，也照价付了钱。红军错杀穷人张五妹一头猪，照价赔偿八块银元。

现黎平会议纪念馆里展陈有一张当年红军过黎平时使用的面额伍角的“苏币”一张，币长11.7厘米，宽6.6厘米，正面呈蓝色，上方

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字，中间有图案和“伍角”字样，左右两边的角有“伍角”字样，下边有“凭票贰张兑换银币壹元”字样，编号为798628，另印有毛泽民的俄文草体签名，四周为花纹，背面呈赭黄色，上方有“国家银行”四个字，左右两边的角有“伍角”字样，下边有“一九三三

年”五个字。纸币上的字，横则从右至左、竖则由上至下。

作者：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
支行课题组 组长：王笑冬

撰稿人：杨光明 龙帅 供稿
人：杨文亮 杨雪莲 李明 姜亮)

(资料来源：黔东南州各县市金融志、文书)

民国贵州军阀币研究

——简谈贵州汽车币

■ 贵州省建设银行供稿

一、什么是贵州汽车币

贵州汽车币，是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贵州造币厂为纪念贵阳——桐梓公路通车而铸造的一圆银币，正面中央为“贵州银币”四字，上方为“中华民国十七年”，下方标注“壹圆”，其背面的主图与同时期的机制币不同，为汽车图案，因此又被称为“汽车币”。



二、贵州汽车币的独特之处

贵州汽车币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它与当时流通使用的银币，有几个不同点：

一是有暗记。在图案的草地中隐藏着由草叶构成的“西成”两字暗记。这是周西成的高明之处，既作了暗记，又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名留后世”。作为黔地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周西成，没有发行自己的人像币，这比同期的唐继尧、陆荣廷、张作霖等军阀当仁不让地发行自己的人像币，显得“谦虚”多了。



二是寓意，草丛由28只草叶构成，寓示该币是1928年铸造发行的，并与正面“中华民国十七年”遥相呼应。汽车前后车轮各为12根辐条，寓意一年12个月平安吉祥，顺顺利利。

三是圆两并用，当时民国铸币多以圆为单位，但是此币两者皆有保留，尤为独特。再加上民国年间的机制币多以人像为主，该汽车图案是贵州的第一辆汽车，是周西成从香港购来的美国福特牌敞篷汽车。银币上的汽车图案即以此车为原形。用汽车作银币图案，是近代银币中绝无仅有的，它与光绪龙、大清龙以及以人物为图案的近代银币相比，确是独出新裁而很受时人喜欢。加上贵州汽车币总发行量五万枚，实际发行数仅为三万八千枚，留存下来的也很少，因此格外受人喜爱。

三、贵州汽车币的由来

说到汽车币，我们不得不说一说当时时任贵州省主席周西成，此人身世颇具传奇色彩，周西成民国初期从一个小哨官一步步成长为贵州省主席，25军军长，陆军上将。

在担任省主席的三年多时间里，把贵州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建立贵州大学，修筑了贵阳到黄果树、贵阳到遵义桐梓的公路，开办了诸多工厂。兴建了电厂，使贵阳首次用上了电灯。

贵州这块土地，几千年来，都是被贬斥为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不用说历史上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时期，就直至今日，不说普通人，就连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也还对贵州一脸茫然，不知所云。可就是这个周西成，一个桐梓大山里走出去的乡下小子，在执掌贵州军政大权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却创造了许多许多的贵州第一。令贵州这个局促于西南一隅的以落后贫穷战乱无为而埋没于世的小小省份，一时之间大开风气大张声势大踏步跃进，跻身于全国先进省份行列，被国民政府褒扬为“南黔北晋，隆治并称”。他在贵州一省创建的第一，可谓指不胜屈。略举几项，可见一斑。

自古人们贬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坎坷不平，崎岖陡峭的山路使得诗仙李白浩然慨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贵州的贫穷落后边远蛮荒，大多都是源出于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贵州面貌，疏浚交通畅达物流实乃当务之急。明智的周西成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故此他视

修筑公路为“开贵州之生路，辟全省之财源”的前提。

当时周西成明令同时开修全省三条主干道。即：1.贵赤线：自贵阳经乌江、遵义、桐梓、温水、土城，而达赤水，以求与合江的轮运相接，全长400余公里。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开工，次年四月二十七日，至桐梓段通车，通车里程220.61公里（后改走由桐梓经松坎、崇溪河入川於民国二十四年全线通车）。2.贵西路：自贵阳经清镇、平坝、安顺、镇宁、关岭、安南、普安、盘县而达云南平彝，全长400余公里，民国十六年三月开工，次年一月通车至安顺，长154.46公里。3.贵南路：自贵阳经龙里、贵定、都匀、独山而达麻尾入广西南丹。全长334.67公里。民国十七年春开工，自贵阳至甘把哨段长121.5公里。直至八十年后社会已步入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其后几代人修筑的国道、电气化铁路、高速公路几乎全部都是遵循当年周西成测定的路线。因此可以自豪地说是黔人周西成破天荒的开辟了贵州第一条公路。

民国十五年（1926）前，绝大多数贵州人从不知汽车为何物。周西成为了以事实说服反对修公路的各界人士，决定路未修好先买汽车。遂派人到香港买回了贵州的第一辆汽车，由于贵州没有公路，这

辆汽车是拆散后，人挑马驮运入的。

为了真正的让汽车造福于贵州人民，而不仅仅是为军政士绅达官贵人服务，周西成鼓励桐梓籍人士黄丕谟、熊逸滨并联络韩元熙、袁千臣等人集资数万元，于1927年5月8日成立贵州先导运输公司。周西成电命第25军和贵州省政府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谭星阁，在上海购买道奇车十辆，又派30名贵州青年赴上海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学习驾驶修理技术。随即又陆续成立了四十余家车行，至1934年，贵州的汽车已达83辆。贵州的交通运输自此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贵州省省道贵阳至桐梓公路竣工通车。周西成他决定开始重新铸币，打铸一套属于贵州省自己的银币以示纪念，此时颇具想法的周西成决定采取为钱币图案，锻造发行贵州汽车银币，这便是汽车币的来历。

四、汽车币现存版别

由于当时铸模全靠手工生产，工人的雕刻图版有所不同，贵州汽车币分为二种版式，其一为“28叶”版，意为草丛最右侧为两根草，是相对常见的版别，从首席数据库中查得，在SBP2015年香港春拍中，PCGS-AU58民国17年贵州壹圆汽车以53775美元成交，约合34万人民币；其二为“29叶”版，已

为草丛最右侧为三根草，此版别相对少见，不超过总数的5%，在中国嘉德2012年春拍中，民国17年贵州壹圆汽车三叶，以172500人民币成交。还有因轮胎的钢丝数量和挡风玻璃宽窄不同，形成多个版别，在此且不作讨论。



28叶版汽车币 29叶版汽车币

不过，令贵州省人民遗憾的是，在1929年，李燊率军入镇宁，突袭周西成，周西成死于流弹，当时全省哀悼，葬其于虎峰南麓。而贵州汽车币也随之停铸，也因此使得目前存世不多，成为众钱币藏家喜爱的钱币藏品。

五、贵州汽车币的纪念价值

贵州汽车币记载着贵州的第一辆车，第一条公路，也记载着贵州交通运输的第一人，标志着贵州的交通运输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贵州省不再是世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它不仅在钱币收藏上极具价值，更在贵州历史上拥有重大意义，它既是简单的一块银币，它又是历史的丰碑，让我们永远铭记贵州汽车，贵州公路的从无到有。

参考文献：

- 1.《黔疆传奇周西成其人其事》2011-12-27《贵州便民网》
- 2.《周西成与贵州“汽车银币”》黄成栋 2006-01-10《贵阳文史》
- 3.《周西成其人其事》程昭星 1986-03-02《贵州文史丛刊》
- 4.《独一无二的“贵州汽车银币”》高汉祥 2012-07-13《金融时报》

南朝梁双柱四柱五铢初考

■ 王子华

中国历史上早期行用钱里带星柱的情况，主要出现在两汉和王莽时期的货币上，作“标记”的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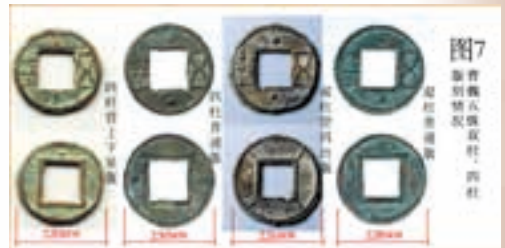
途，基本无规律（图1—图2）。同时也有出现在“吉祥花钱”上的情况（图3），特别是王莽时期的货

币出现星柱情况是较为普遍的（图4），多数是以“星象”为吉祥寓意主题的特点（图5），行用钱上所增加的星柱等类容与“币值”没有直接联系，且也无详细的历史记载。



汉末魏晋时期，五铢钱币中出现了“双柱、四柱”星柱位置较为标准固定的行用钱，但是历史记载中没有记录这类货币的特别意义，

究竟双柱和四柱代表什么已无从考证。这其中有一类五铢钱大量发现在三国时期魏国的故地，现代钱币学界将这种文字风格和制式的五铢归为“魏五铢”。这类五铢除了一般版式外，有带决文、四出等版式（图6），同时出现钱文正面穿上下有规范的两颗星柱的“双柱五铢”（图7），还有除了正面穿上下带星柱外，背后左右也各有一颗星柱的“四柱五铢”（图7），这两类“双柱五铢”和“四柱五铢”出土和发现，数量虽然比普通版式少但是并不少见。还有一类正面穿上下和背后穿上下有星柱的“四柱五铢”（图7），整体形制稍微小一点，星柱也小，这类比较少见，是否和“魏五铢”是同一类别也无法考证。



南北朝时期，星柱这一现象出现在一些不同风格、版别的五铢钱



上。纵观整个南朝的铸币，“南朝宋”所铸造的“四铢、两铢、孝建”等货币（图8），其文字纤细，形制娇小。接下来的“南齐”延续了宋的铸币风格，其铸造的五铢形制与文字风格和宋较为相似（图8）。到了“南梁”时期，铸币形制和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据唐朝李延寿撰《南史》卷五十二南平元襄王伟传中有记载：“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封建安王。初，武帝军东下，用度不足，伟取襄阳寺铜佛，毁以焉钱”。《隋书》食货志说：“梁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丁福保在《古钱大辞典》中引用了前贤对内郭五铢的论述：“唐大典：梁武帝置二种钱，内有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又除其内郭，谓之女钱。”上述记载中南梁所铸造的五铢钱：一种“无廓”的五铢钱，被学界称为“公式女钱”并无异议。另一种“肉好周郭”的钱币，就是被学界称为“天监五铢”的货币，也是一直困扰钱币界的一大悬案：“天监五铢究竟是什么样的？”记载中唯一的线索：“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应该是和之前两朝“娇小羸弱”的钱币有很大的区别，重量大小推测与汉早期的五铢钱相当。从“南梁故地”货币实物的出土发现来看，有一种铸造规整钱文风格区

别于以往的五铢钱币，符合“天监五铢”的记载，所以有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这类五铢就是历史记载的“天监五铢”（图9）。然而，此类风格的五铢钱也在“北周故地”出现，有时还伴随“北周三品”（图9）一起出土。从文字风格，钱币形制来看与“北周三品”极为接近，因此有的学者将其归入北周铸币，称为“北周五铢”（图9）。从铸造时间来分析，“天监五铢”铸造于公元502年，而北周建立于公元557年，两者相差55年。而且在北周建立的同一年，南梁也改朝换代，取而代之的是南朝陈。从货币实物来看，在南梁故地发现的“天监五铢”比“北周五铢”要稍微小一点，轻薄一点，并且可以分辨出早期、中期、后期逐渐减重的体系（图10）。此类五铢发现数量少，是否因为后期不断被私家熔铸谋取利益就不得而知了。按常理说，南北两地应该不会同时都铸造如此相似的流通货币，所以“天监五铢”和“北周五铢”的争论一直存在，至今无定论。



图8 南齐与南梁铸币文字风格对比图



图9 北周与北梁铸币文字风格对比图



图10 北周与北梁铸币文字风格对比图

我个人观点推测，是否可以从梁故地发现得到确认的“双柱五铢”来反推“天监五铢”的形制？双柱五铢是梁后期发行的货币，按理应该和早期的“天监五铢”风格接近。而从“天监五铢”逐渐减重的体系来看，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特点。无独有偶，近年在南梁故地的南京发现了新形制的“四柱五铢”，区别于以往的四柱五铢，钱币正面没有星柱，而是在钱币背面上下左右各有一颗标准的星柱。该钱的形制、文字风格与梁系天监、双柱五铢一脉相承。这样一来，南梁铸币从“天监五铢”、“公式女钱”开始，逐渐出现减重，到后来铸造“双柱五珠”（图11）和“四柱五铢”（图11）的整个五铢铸币系统就完整了，同时和历史记载也相吻合。

在相关南梁铸币记载中，出现过双柱和四柱五铢的铸造和兑换比值的记录。《隋书·食货志》载：梁末敬帝绍泰二年（556年）“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鹤眼轻。私家多溶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梁书》载：“太平二年（557年）夏四月己卯铸四柱钱，一准（准通“当”）二十...壬辰改四柱钱一准十，丙申，复闭细钱”。从上述记载来看，公元556年铸行“双柱五铢”，以形制重量相对规范的货币和市面上“鹅眼恶钱”并行，结果民间大量的将双柱五铢熔化铸造鹅眼钱来牟利，市面上的货币形式十分混乱。一年后（公元557年4月），又铸造“四柱五铢”，最初按照一枚四柱五铢当二十枚普通钱使用，结果在短短的14天以后，改规定为一枚四柱五铢当十枚钱使用，新改的规定颁行了4天后停止铸造。也就说“四柱五铢”从开铸到停止只经历了短短的18天，新的货币和兑换政策让南梁的货币经济进一步的混乱，从而根本无法通行。



图11 北周与北梁铸币文字风格对比图



此次发现的“梁系四柱五铢”实物，可以对史书上记载的南梁铸造四柱五铢分辨划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学界对记载中梁铸“四柱五铢”的认定十分模糊。往往将在三国魏故地发现的“四柱五铢”和南梁记载中的“四柱五铢”混为一谈，但是魏四柱五铢与记载内容有许多无法解释的地方，一是：魏四柱五铢发现量大，记载中梁四柱五铢只铸行了18天，按理不可能出现大量货币实物。二是：记载中梁铸造四柱五铢，最初是“以一当普通钱二十，后改为当十”，就算以一枚当十枚当时的杂钱，其重量大小也要远比“魏四柱”质量高很多。三是：“魏四柱”大量发现于三国时期魏国的故地，且有着自己完整的一套五铢系列，包含普通版别、双柱五铢、四柱五铢，大小风格基本一致，和在梁故地发现的“梁系”五铢的风格完全不同。因此，学界对记载中“梁四柱五铢”的判定争论很大。新发现的梁四柱五铢，钱文风格是梁系五铢的风格，而且极为稀少，符合了记载中短暂铸造的特点。同时，新发现的梁四柱五铢形制、重量都比梁故地发现的杂钱大很多，也较之前发现的“梁双柱五铢”大，与“魏四柱五铢”不可同日而语，符合记载里“以一当二十、以一当十”的特点。正是新发现的

“梁四柱五铢”，填补了梁系五铢“四柱”的空白，完善了整个梁系五铢的体系，也矫正了一直以来学界对“梁四柱五铢”的模糊定义。可以进一步推论的是，“梁系五铢”中的双柱和四柱与早前发现的“魏系五珠”的星柱体系，应该不属于同一种性质作用。魏系五铢无星柱之历史记载，从实物来看星柱五铢的重量、大小、形制、文字风格基本与普通魏五铢无异，星柱应该和四决、四出等版别一样属于标记，并无实际意义。反观梁系五铢有星柱的历史记载，而且记载中明确了双柱五铢与普通杂钱并行，但是被竞相私熔用于铸造小钱，说明了梁双柱五铢的重量和形制要大于当时并行的杂钱。一年后又铸造的四柱五铢更是和普通钱有了比值的区别，一枚当二十和之后的当十枚，这就说明了，梁系星柱五铢的铸造是带有“兑换比值意义”的，这是“四柱五铢”和普通钱真正意义上的区别，其在货币经济上的意义与魏系四柱五铢完全不一样。而魏系星柱五铢的铸造发行早于梁系星柱五铢，梁系的星柱五铢的铸造是否借鉴了魏系五铢的特点？还是古人对货币上增加“星柱”是为增值之特征？这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魏、梁两系之间的星柱五铢特点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

的。而且在此之后的历代铸币也有星柱的情况，但都只是起到标记的作用，无兑换比值之说，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新发现的“梁四柱五铢”在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历史记载在南梁最后一次铸造货币之后约半年的时间（公元557年10月），梁敬帝萧方智禅位于陈霸先，南梁灭亡，取而代之的是陈霸先所建立的“陈朝”。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齐、梁、陈”进入了最后一个时期。可以肯定的是，南梁在铸造“两柱五铢、四柱五铢”的时期，正是陈霸先所“控制”下的时期，

相关的南梁货币政策一定出自他。此后南朝陈文帝天嘉五年（564年）改铸五铢，史称“陈五铢”。初发行以一当鹅眼之十。但此型没见柱星。由此可以猜测，从南梁灭亡到“陈五铢”铸行之前的这7年间“两柱五珠”应该还在铸行。而且，陈霸先控制下的南梁铸行“两柱、四柱五铢”是否为之后的“陈五铢”铸行起到了尝试性作用？这就不得而知了。

作者：光华钱币博物馆馆长 贵州省钱币学会副秘书长

略论唐代货币制度的 发展及几点启示

■ 宋康年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

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反过来，政治局面也直接影响到它的经济结构形式的发展。唐代的货币经济，又



何尝不是沿着这一条规律?！隋亡以后,从李渊建立唐王朝(618年)一直到哀帝四年(907年)止,近三百年来,一直是沿用“开元通宝”钱,并没有退出流通领域,这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是很少有的。所以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开元通宝”这一流通货币,尽管其中也铸行过“乾封泉宝”“乾元重宝”等钱币,但铸行时间均不长,与此同时“开元通宝”钱,却始终没有退出流通领域。这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是板其罕见的,所以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开元通宝’这一货币制度,为什么在三个世纪的漫长年代里,能经久不衰地长期流通而受到人们的信赖?它对我国货币发展又有什么积极影响,以及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现就以上问题略抒一孔之见,不妥之处,尚祈专家学者赐教。

一. 唐代铸行货币的基本概况及特点

应该肯定,唐代一直是执行“法定”的货币制度,这一货币流通制度,被后来各代所沿用,直到清末方孔园线钱才退出流通领域为止,共约一千三百年。其原因是:隋亡后,唐高祖李渊於“武德四年(631年)”废五铢钱,改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一铢四,积

十钱,重一两”使我国的方孔园钱,不再以两,铢等重量命名。在铸造上也很讲究,钱文由纪事中欧阳询书写,为八分篆隶体体构架,章法精美,使“开元通宝”在百姓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从而为以后巩固“开元通宝”币制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从后来几次铸币,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唐高宗李治於乾封元年(666年)铸行的“乾封泉宝”,为虚值钱,径2.4厘米,重3.5-4.2克,以一当十,与“开无通宝钱并行,但因它与“开元通宝”钱的比价过高,引起流通紊乱,百姓纷纷拒用,因而铸行不到几个月就停止了。

唐肃宗李亨乾元元年(758年)又铸行“乾无重宝”钱,实为虚值钱,径2.6-3厘米,重6-10克,也是以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并行,同样不受百姓的欢迎。次年(沁759年)又铸“重轮乾元重宝”大钱,径3.5厘米,重12克左右,仍是一以当十,与“开元通宝”钱并行,同样由于虚值的原因,铸行后,民间称之为“虚钱,”因当时用虚钱利大,致使民间一时盗铸盛行,造成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一时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到唐代宗李豫接位后(762年)迫于币制紊乱,便诏会大小钱等价流通,虚值重宝钱停

铸,使社会才趋向恢复,还应指出的,在这以前,即唐肃宗李亨乾元二年(759年)时,叛将史思明一度占据魏州(今河北大名)寺佛铜器铸行,它虽然以一当百,仍与“开元通宝”钱并行。后改铸“顺天元宝”大钱,径3.6厘米,重18克左右,可是不到一年多时间,又罢。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年)采取废各地铜佛钟磬造钱,仍叫“开元通宝”,钱背上加铸“昌”字,以纪年号,同时还令各州铸钱炉均须在钱背上铭以州名,故对此种钱,后人便称之为“会昌开元”。

直到唐代最后一个皇帝懿宗李准咸通十一年(870年),又铸行“咸通元宝”钱,径2.3厘米,重3克左右,钱文隶书并含有魏体风格,以致使钱开铸不久,即令停止。从以上唐代近三百年的货币制度发展史可以看出:尽管中间几度铸行过几种钱币,但自武德年间铸行的“开元通宝”币制,不但没有被废除而是经久不衰,在流通领域里并行,在某种角度上看还起着主导作用,这不能不说与当时时代背景即唐代统治集团的正统观念和“法定”有密切关系。当然唐代在铸行“开元通宝”币制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应该承认“开元通宝”钱的铸行,在整个时代里,尽管保持了它的形式稳定性,但在质量上不是没有变化的,

阜期的“开元通宝”钱,制作精细,铜质也比较好,而且钱文书写工整精美,大部光背。至中期“开元通宝”钱就比早期“开元通宝”制作要差,钱背多有仰月纹:后期“开元通宝”钱,不仅铜质差,铸工粗劣,钱文书写潦草,钱背开始铸有各种记号,版别繁杂,同时私铸现象层出不穷。从“开元通宝”钱铸造上,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迹象在货币史上已是充分反映出来。

二. 唐代货币制度发展中的几点启示

货币制度,始终是货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任何一种货币,进入流通领域,还是退出流通领域,都不是由货币本身来决定,它反映出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在唐代这个由兴起到强盛以至衰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货币制度一直是在货币经济发展的波浪中向前发展的,作为唐代“法定”的货币流通制度,它一直是处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此进彼退,互为消长的。所以从初唐,中唐,晚唐三个阶段的货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的局面,特别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年代,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商业手工业的



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名家·贵州学术年会 暨新时代·多彩黔币论坛活动报道

易莞娇



2018年5月31日，由贵州省社科联主办，贵州省钱币学会承办，贵州省钱币学会各单位会员协办的“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名家·贵州学术年会暨新时代·多彩黔币—贵州省钱币文化研究学术论坛”在贵阳召开。省社科联、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省博物馆、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省投资管理促进会、各金融机构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知名钱币收藏家和钱币学会会员代表等80余人参加本次学术论坛。



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宗严同志为本次论坛致辞。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贵州省钱币学会会长肖杰同志代表承办单位致辞。

繁荣，经济发展，随之将会带来货币经济发展，但货币经济的发展，又会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尽管在初唐时期，社会上曾出现有“钱愈重物愈轻”的趋势，但“开元通宝”钱，基本上能在人民群众中间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因为初唐在拨乱反正顺应民意，采取货币“法定”的结果，正如唐高宗在下诏停“乾封泉宝”，复行“开元通宝”时，曾在诏书中自责曰：“高祖拨乱反正，受到轨模，太宗立极，承天无所改作，废旧选新，恐乘先旨，其“开元通宝”依旧施行，为万代法。”说明他对“开元通宝”币制是何等崇尚。货币制度的健康发展，应是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前提下才有，否则就会发生紊乱。

其次，从中唐时期看，这个阶段由于处于封建经济盛衰交替，生产关系由先进开始转向落后的过程，特别是正值“安史之乱”，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钱炉关停，致使货币总量的增长难以适应社会商品量的增长速度，从而通货紧缩，货币在流通中相对不足，引起一种货币危机，也就是所谓“钱荒”，形成钱重物轻，于是越是钱荒，大批钱币反被人们贮藏起来，商人囤货居奇一样，当然物价就会猛烈下降，给人民收入带来危机。

正如<旧唐书·食货志>里说的京都时
时，多重见钱，官中支付，钱多不出。
因此说“钱荒”是由于钱重物轻而导
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过
类似钱重物轻的危害：“假设商品总
量已经规定，流通货币的总量，就取
决于商品的价格变动。”这样一个“钱
重物轻，民以为患”的后果。因此，
它给人们带来的启示：货币的铸行量
应与商品总量相辅相成的，偏重一方
，就会造成城寨紊乱。

第三，晚唐时期，包括唐宋之际，这时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集团内部腐败，百姓不满情绪产生，谷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到了唐懿宗和僖宗时，他们更是奢侈腐化，加之对外战争愈演愈烈，从而对人民的赋敛和征收日益加重，弄得民不聊生，终于爆发了震撼唐王朝的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在这样一个战争频繁，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货币经济无疑是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影响，以致造成通货紧缩，一直延续到宋代，因此，它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战争不但给国家建设带来破坏，给人们带来灾难，同时对货币经济的发展也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作者：中国钱币学会会员 安徽望江县博物馆

第三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名单·贵州学术创新时代·多彩贵州—贵州钱币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贵州省钱币学会

2016年1月·贵阳

暨新时代·多彩黔市

主办 单
承办 单
协办 单

A man in a striped shirt is speaking at a podium. The podium has a logo on it. Behind him is a blue backdrop with white text that reads "第三届... 暨新时代·多果".